

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识别及测度

麻学锋, 吕逸翔

(湖南工商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长沙 410205)

摘要:以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为研究目标,构建二者的响应模型,识别和测度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结果表明:(1)通过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由于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影响,幸福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受不同幸福外在因素的影响,关联度从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向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等经济因素转变。(3)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路径区别于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后,再满足非物质需求的传统幸福水平提升路径,而是先被动地改善“非物质”需求继而带动“物质”需求改善以提升幸福水平。研究成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城镇化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及借鉴。

关键词:旅游城镇化集聚;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响应;识别;张家界

“幸福”,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追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1]。21世纪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出现了居民幸福水平并未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的“伊斯特林”悖论^[2]现象。2008年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幸福发展观”逐渐取代“唯GDP发展观”成为世界各国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的新标准。我国也将“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核心要求,众多地方政府则将构建“幸福”城市设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3]。当前,由于经济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我国投资经济效益下降和出口风险增大,“消费”成为推动我国新时代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4]。旅游业既具有天然的集聚特性^[5],能够通过旅游产业集聚推动城镇化发展,又对扩大消费具有正向积极作用^[6],成为当前推动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即将完成,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将得到大幅提高,满足人民的非物质“幸福”将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路径^[7]。2018年,旅游业更被列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因此,探讨旅游城镇化与幸福的关系成为学界的必要命题。已有研究表明,旅游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建设存在密切联系^[8],并且对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9]。对相关文献梳理后还发现:第一,旅游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10-12]、环境^[13]方面,对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尚待拓展和深化。第二,居民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主要以个体研究为主,如

收稿日期: 2020-03-23; 修订日期: 2020-04-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4);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JJ40143)

作者简介: 麻学锋(1970-),男,湖南凤凰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旅游经济、旅游地理研究。

E-mail: maxuefeng90@163.com

心理学家卡尼曼提出的日重现法。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旺楚克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的概念^[14]后,对居民幸福水平的研究开始上升到国民幸福指数的宏观研究层面,世界各国也开始将“幸福”纳入到衡量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的体系^[15-17]。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居民幸福指数,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标测算^[18-20]、影响因素^[21,22]及差异对比^[23,24]等静态的、横向的方面,对于居民幸福水平的动态变化及纵向比较等方面则有所欠缺。鉴于旅游业和城镇化都具有提高居民幸福感的作用^[25,26],本文选取旅游城镇化典型的张家界作为案例地,尝试对其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与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问题进行探究,以期一方面深化空间经济学集聚问题关于社会影响的研究,拓展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使其更加具体化;另一方面推动旅游学、地理学与幸福经济学的跨领域发展,为我国脱贫攻坚战略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脱贫工作的可持续进行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旅游业、城镇化与幸福之间的内在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实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资源空间分配不均衡、区域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的不合理的空间格局^[27]。发达地区凭借政策和区位优势,社会经济优先得到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但也深受交通拥堵、生活压力、医疗保障等问题困扰而导致幸福水平低下^[28]。欠发达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相对贫困,亟需将自身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改善居民物质生活来提升幸福水平^[29]。旅游业作为当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新兴休闲产业,具有极强的关联效应,发展旅游业不仅可以提升旅游者幸福感,还可以推动旅游目的地城镇化发展。欠发达地区通过开发旅游资源,为发达地区居民提供旅游产品,在满足其放松身心、缓解生活压力的需求,提升其幸福感^[30]的同时,还可以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吸引资金、劳动力向欠发达地区集聚,促使当地调整经济结构、满足就业需求、建设基础设施、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文化交流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31]。幸福作为人们对自身生存的客观条件及精神价值得到满足而形成的主观认知^[32],意味着改善欠发达地区居民客观生存环境及满足精神需求均会作用于居民的幸福环境感知而影响其幸福水平。因此,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改善,会推动当地居民经济生活、社会福利、生存环境、文化氛围等幸福外在因素的改变,进而影响着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3],推动居民幸福水平随着旅游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此外,欠发达地区在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推动其逐步转化为发达地区,旅游产业也随之向周边扩散,在溢出效应的影响下,旅游业又将推动次级欠发达地区实现旅游城镇化,并提升次级欠发达地区居民幸福水平,逐步达到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升人民总体幸福水平的目的(图1)。

1.2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张家界市位于湘西地区,辖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境内旅游资源丰富,除峰、洞、湖、温泉等自然旅游资源外,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等多种文化旅游资源。张家界立市以来,以旅游为发展契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从贫穷偏远的湘西小镇发展为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自1989年立市

至2018年，城市GDP从14.74亿元增加到578.92亿元，城市人口从18.45万增加到75.66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9年的751元上升为24825元。地区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质量空前提高。近年来，张家界市政府不断改善民生、美化环境、优化产业结构，2017年入选“国家森林城市”及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强，城市幸福水平不断提升。

本文主要选取张家界1990—2018年《张家界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张家界市及所辖各区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部分年份缺失数据根据已有数据采用逐年插值法补齐。

1.3 研究方法

1.3.1 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测算

前人通过研究发现旅游地依托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在空间上围绕中心景区，以交通通道为纽带，形成景区、城区、社区、园区四位一体的空间集聚现象^[34]。由此可知，旅游产业天然的集聚特性，极易在旅游地形成产业集聚，并推动旅游地城镇化形成空间集聚。基于此，本文选用区位熵模型，并引入“城镇化空间集聚”的地理概念，得出城镇化空间集聚水平 C_i 。通过计算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对城镇化空间集聚水平的作用大小来衡量一个地区旅游城镇化的集聚水平，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越高，则说明该地区旅游城镇化总体水平越高。计算公式为：

$$C_i = \left(\frac{C_{ij} / C_{kj}}{C_i / C_k} \right) \quad (1)$$

$$CQ = \left(\frac{E_{ij} / E_{kj}}{E_i / E_k} \right) / C_i \quad (2)$$

式中： C_i 指城镇化集聚水平； C_{ij} 指*i*地区城镇化区域*j*的面积（ km^2 ）； C_i 指*i*地区的行政区域面积（ km^2 ）； C_{kj} 指区域*k*城镇化区域*j*的面积（ km^2 ）； C_k 指区域*k*行政区域面积（ km^2 ）； CQ 指旅游城镇化集聚度； E_{ij} 指*i*地区产业*j*的产值（亿元）； E_i 指*i*地区的总产值（亿元）； E_{kj} 指国家或区域*k*产业*j*的总产值（亿元）； E_k 指国家或区域*k*的总产值（亿元）。 $CQ \leq 1$ 说明*i*地区*j*的旅游城镇化集聚度低于国家或区域*k*上*j*的平均水平，旅游城镇化分布相对分散； $CQ \geq 1$ 说明在*i*地区*j*旅游城镇化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水平， CQ 越大，则表明集聚度越高。

1.3.2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指标体系的构建

幸福指数是目前用来衡量居民幸福水平的主要测量方法，前人对幸福指数评价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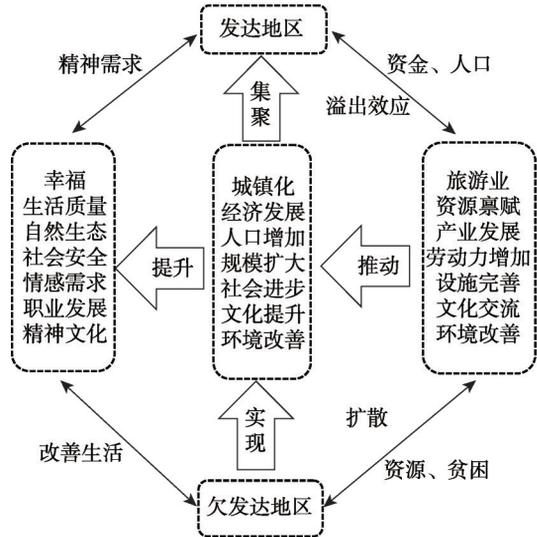


图1 旅游业、城镇化与幸福的内在机理

Fig. 1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urbanization and happiness

体系的构建主要分为主观性指标^[35,36]、客观性指标^[22,37,38]、主客观结合性指标^[21,39]三种。“幸福”虽是个体主观的认知感受,但客观景观的变化能够引起人的认知变化,是认识客观景观变化下旅游社区社会现象的有效途径^[40]。因此,出于对居民幸福水平纵向研究的现实需要,本文以十九大提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研究目标,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主要选取客观性指标建立了生活质量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安全环境、家庭情感环境、职业发展环境、精神文化环境共6个子系统,29个客观性指标的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1) 设有 m 个评价对象, n 个评价指标, 则指标值矩阵为 $X=(x_{ij})_{m \times n}$, 其中 $i=1, 2, \dots, m; j=1, 2, \dots, n$ 。将矩阵按照以下模型进行标准化及无量纲化处理:

表1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生活质量环境	人均GDP (+)	元	0.0522	
		可支配收入 (+)	元	0.0323	
		恩格尔系数 (-)	%	0.0177	
	自然生态环境	人均消费性支出 (+)	人均消费性支出 (+)	元	0.0308
			人均年末住房面积 (+)	m ² /人	0.0209
			污水处理率 (+)	%	0.0821
		森林覆盖率 (+)	森林覆盖率 (+)	%	0.0197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m ² /人	0.045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0.0378
			社会安全环境	养老保险覆盖率 (+)	%
	医疗保险覆盖率 (+)	%		0.0798	
	城市人均道路面积 (+)	m ² /人		0.0143	
	万人拥有公交台数 (+)	标台/万人		0.0135	
	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 (+)	张/万人		0.042	
	社会福利占财政支出比例 (+)	%		0.0189	
	家庭情感环境	用水普及率	用水普及率	%	0.0269
			燃气普及率	%	0.0194
			结婚率 (+)	‰	0.0089
			离婚率 (-)	‰	0.0182
	职业发展环境	职工年平均工资 (+)	职工年平均工资 (+)	元	0.0483
			失业率 (-)	%	0.0256
			就业人数 (+)	人	0.0162
	精神文化环境	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	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	人/亿元	0.0203
			高中毛入学率 (+)	%	0.0354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	%	0.0096
		文教娱乐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 (+)	文教娱乐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例 (+)	%	0.0247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	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	%	0.0387
		体育场地数 (+)	体育场地数 (+)	个	0.125
	文教机构数 (+)	文教机构数 (+)	个	0.0393	

$$\text{正向指标: } T_{ij} =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 0.00001 \quad (3)$$

$$\text{负向指标: } T_{ij}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 0.00001 \quad (4)$$

(2)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

$$h_j = -\frac{1}{\ln(n)} \sum_{i=1}^n \frac{T_{ij}}{\sum_{i=1}^n T_{ij}} \ln \frac{T_{ij}}{\sum_{i=1}^n T_{ij}} \quad (5)$$

(3) 对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测度:

$$U = \sum_{i=1}^n \left[1 - \frac{h_j}{\sum_{i=1}^n (1-h_j)} \right] \times \frac{T_{ij}}{\sum_{i=1}^n T_{ij}} \quad (6)$$

式中: $1 - \frac{h_j}{\sum_{i=1}^n (1-h_j)}$ 为幸福指数指标权重; $\frac{T_{ij}}{\sum_{i=1}^n T_{ij}}$ 为居民幸福指数体系中各项指标经数据

标准化和非负化后的无量纲值; T_{ij} 为指标*j*中*i*年的标准化数据; h_j 为第*j*项指标的熵值。

1.3.3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响应模型的构建

已有研究表明, 旅游产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在人口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统筹、空间布局及功能完善等方面具有高度融合性^[8], 且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提升居民的幸福感知具有重要作用^[26]。通过上文对旅游业、城镇化与幸福三者之间作用关系的论述, 可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理解为: 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提升, 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客观层面产生影响, 并作用于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进而影响居民的幸福外在因素, 导致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发生变化。因此, 本文参考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模型^[41]的建模思路, 构建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R = U/CQ \quad (7)$$

式中: R 为响应系数; U 为幸福水平; CQ 为旅游城镇化集聚度; 系数越大, 表明响应强度越大, 反之则越小。

1.3.4 灰色关联度

旅游城镇化在集聚发展过程中, 会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并作用于当地居民的幸福感知。也就是说, 居民幸福水平在旅游城镇化集聚过程中也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灰色关联度是根据系统因子的差异性来判断其对整个系统影响程度的一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 差异性越大, 其关联度也就越低, 对系统的影响也就越小; 差异性越小, 关联度也就越高, 对系统的影响也就越大。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 可以探析出旅游城镇化集聚发展过程中, 受客观景观变化的影响, 幸福外在因素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变化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关联系数:

$$\gamma_{oi}(k) = \frac{\min_i \min_k |x_0(k) - x_i(k)| + \delta \max_i \max_k |x_0(k) - x_i(k)|}{|x_0(k) - x_i(k)| + \delta \max_i \max_k |x_0(k) - x_i(k)|} \quad (8)$$

式中： $\delta \in (0, 1)$ ， $k = 1, 2, \dots, n$ ； $i = 1, 2, \dots, m$ ； $\gamma_{oi}(k)$ 为关联系数； $x_0(k) - x_i(k)$ 为差序列。

关联度：

$$\gamma_{oi} = \frac{1}{n} \sum_k \gamma_{oi}(k) \quad i = (1, 2, \dots, n) \quad (9)$$

2 结果分析

2.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分析旅游城镇化集聚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响应，首先要证明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利用式(2)、式(6)计算得出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后，以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为自变量 X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为因变量 Y ，利用EViews 6.0对二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从表2可知，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引起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不是引起旅游城镇化集聚的格兰杰原因，二者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表2 旅游城镇化集聚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Table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and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假设	观测值	F统计值	P值	决策	结论
旅游城镇化集聚不是引起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上升的原因	27	4.90004	0.0174	拒绝原假设	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引起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上升的原因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不是引起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原因	27	0.95487	0.4002	接受原假设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不是引起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原因

2.2 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识别与测度

利用式(7)得出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于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图2)。从图2可知，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响应的时序性演变过程总体呈“U”型，即初期响应强度最大，后随着发展响应强度逐渐下降，2000年触底之后又逐渐上升。对响应系数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可将其划分为：快速响应期(1989—1994年)、低速发展期(1995—2007年)、稳定提升期(2008—2017年)。

(1) 快速响应期：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高于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响应强度均在0.08以上，均值为0.1055。主要是因为1989年张家界开始以地级市运行，依托旅游资源的天然优势，市政府开始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行景区景点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产业迅速得到发展。1992年武陵源风景区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后名声大振，旅游产业的经济地位得到提升，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众多农村劳动力前来就业，大量资金、劳动力的流入，推动了张家界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24.39%，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76.11%，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相应得到提升。

(2) 低速发展期：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反超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响应系数急剧下降，并持续走低，均低于0.05，均值为0.027。随着火车站扩建完成、其他交通道路的完善，以及1994年张家界荷花机场通航，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急速上升，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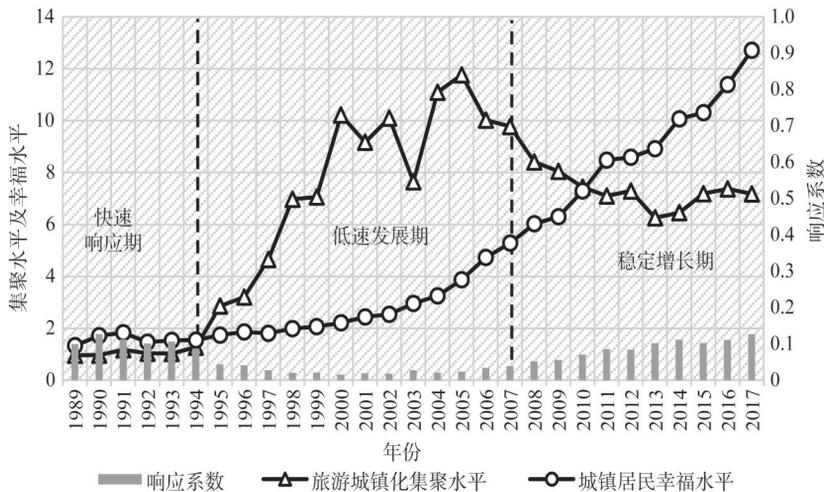


图2 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及其响应系数变化趋势

Fig. 2 Trend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level,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and response coefficient in Zhangjiajie

2010年增长率达到257.7%，之后又迅速下降；然而张家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31.36%，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了236.41%，地区经济依然得到了持续发展。与经济的迅猛增长不同的是，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指数却提升缓慢，幸福水平响应系数只增长了9.99%，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22.23%，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增长了15.43%，万人卫生床位数增长了33.39%，万人拥有公交台则下降了37.28%，远远低于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由此可知，这一阶段，张家界陷入“伊斯特林”悖论，物质生活的改善已经不能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3) 稳定增长期：城镇居民幸福水平逐步爬升，并于2010年再次反超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响应系数均高于0.05，2013年之后超过0.1，均值为0.0899。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把实现人民的幸福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宗旨；2012年党的十八大同样将“以人为本”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幸福”开始融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中。这一时期张家界也开始将城市发展建设与旅游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提出了建设“世界旅游精品”的总目标，城市发展开始从旅游目的地向旅游城市目的地转变。张家界以旅游业“三星拱月”的基本分布格局作为依托，城镇建设方面构筑了“一主两副三轴四沿”的空间布局，形成了城区、景区“一小时交通圈”，大力推进“景城一体化”，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持续提升。此外，张家界还以“低碳、生态、宜居、宜游”为口号，进行“穿衣戴帽”工程建设，引森林入城，引民族文化入城，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和分区，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这一时期，张家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增长了54.57%，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增长了204.82%，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增加68.32%，万人公交台数增长118.13%。总体来说，居民“非物质”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幸福水平也不断提高。

2.3 影响因素

由分析可知，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呈阶段性特征，可

见各阶段作用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依据式(9),以基本生活响应强度、环境质量响应强度、社会安全响应强度、家庭情感响应强度、职业发展响应强度、精神文化响应强度为影响因素,对各阶段6个外在影响因素与响应系数进行关联度分析(表3)。

表3 各阶段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影响因子与响应系数灰色关联度分析

Table 3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response coefficients and factors of Zhangjiajie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at each stage

阶段	子系统	关联度	排序	阶段	子系统	关联度	排序	阶段	子系统	关联度	排序	
快速响应期	生活质量	0.6067	5	低速发展期	生活质量	0.6422	4	稳定提升期	生活质量	0.8995	2	
	环境				环境				环境			
	自然生态	0.7676	2		自然生态	0.7114	3		自然生态	0.8406	4	
	环境				环境				环境			
	社会安全	0.7303	3		社会安全	0.7370	2		社会安全	0.9147	1	
	环境				环境				环境			
	家庭情感	0.5633	6		家庭情感	0.6283	5		家庭情感	0.5119	6	
	环境				环境				环境			
职业发展	0.7227	4	职业发展	0.7778	1	职业发展	0.8469	3				
环境			环境			环境						
精神文化	0.8138	1	精神文化	0.6214	6	精神文化	0.7923	5				
环境			环境			环境						

(1) 快速响应期: 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安全环境为响应强度较大的影响因素。旅游业发展初期, 游客的进入带动信息流率先输入, 对当地居民的文化习惯等精神文化产生冲击。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 居民也开始接受和学习外来文化而对精神文化环境产生影响, 关联度高达0.8138; 随着旅游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游客的旅游需求得到满足, 旅游活动的开展及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又作用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 关联度为0.7676; 交通、医疗、治安等旅游业相关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 间接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社会环境质量, 关联度为0.7303; 而大量旅游活动的开展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职业发展环境受到极大影响, 关联度为0.7227;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职业环境的改善, 居民收入得到增加, 生活质量环境也得到改善, 关联度为0.6067。

(2) 低速发展期: 这一阶段, 职业发展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关联度较高。由于对外联系和交流的加强, 外部信息与文化对当地产生的影响逐渐缩小, 关联度为0.6214; 旅游业为了进一步的发展,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旅游从业人员、旅游基础设施、旅游资源质量等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 直接推动了城镇居民职业发展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 关联度分别为0.7778、0.737、0.7114;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带动了居民生活质量环境的进一步提高, 关联度为0.6422。

(3) 稳定提升期: 这一阶段, 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职业发展环境关联度较高。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游客对旅游服务供给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 为了满足游客需求, 政府对交通、医疗、治安等配套服务软件质量进行优化升级, 社会安全环境关联度达到0.9147; 伴随着旅游业与地区经济和居民生活的深度结合, 旅游业对生活质量的逐步增强, 关联度为0.8995; 同样地, 旅游需求的优化升级对从业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职业发展环境关联度为0.8469; 而由于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环保手段的成熟, 旅游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渐减小, 关联度为0.8406; 其次为精神文化

环境, 关联度为0.7923, 家庭情感环境受旅游城镇化影响最小, 关联度为0.5633。

传统的幸福水平提升路径是先满足低层次的物质需求, 再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7]。通过研究可发现: 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路径是在“非物质”需求被动性地得到满足后, 在旅游产业开始发展的基础上, 居民就业问题得到解决, 收入开始增加, 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物质”幸福需求才得到满足, 幸福水平才开始得到主动性提升。由于旅游城镇化集聚最先是以满足发达地区游客的旅游需求为动力进行发展的, 游客对于旅游六要素的相关配套硬件设施, 以及医疗、治安、服务等软件的需求, 促使当地社会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改善, 间接地提升了当地居民“非物质”幸福水平。在此基础上, 游客需求得到满足, 旅游业得到发展, 当地居民实现就业、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物质幸福需求得到满足, 幸福水平得到提升。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以张家界为例, 通过构建旅游城镇化集聚模型测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建立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测度, 借鉴“响应”概念建立模型, 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强度进行识别与测度。结果表明: (1) 通过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 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即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 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受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影响总体呈“U”型分布; 由于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影响, 幸福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受不同幸福外在因素的影响, 关联度从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以文化、自然为主的非经济因素向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等以社会、经济为主的经济因素转变。(3) 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路径区别于传统的幸福水平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 再满足非物质需求的提升路径, 而是先被动性改善“非物质”需求后继而带动“物质”需求改善以提升幸福水平。

3.2 讨论

本文主要从动态发展视角切入, 研究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过程”这一议题, 在前人发现旅游地网络存在空间分层集聚的基础^[34]上, 引入“城镇化空间集聚”的概念, 以区位熵为基础建立模型, 对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进行了识别和测算。此外, 在前人已有旅游地客观景观变化会引起人的景观认知改变^[40]、旅游业发展作用于主观幸福感的外在因素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33]的研究基础上, 引申出“旅游产业发展推动旅游地客观景观发生改变, 导致当地居民幸福感外在影响因素发生变化, 进而对幸福水平产生作用”的结论, 建立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尝试对幸福水平进行识别与测算。在此基础上, 通过建立响应模型对二者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行初步识别与测算, 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积极作用, 并通过作用于幸福的外在因素, 从而导致幸福水平产生变化。本文通过对旅游地旅游城镇化集聚与幸福水平的关系进行探讨, 不仅深化了旅游产业集聚关于社会效应方面的相关研究, 还拓展了幸福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学科的融合。然而, 幸福作为一种个体的主观性感受, 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研究还应当“以人为本”, 而本文为了便于纵

向比较主要选取了外在性客观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出于研究需要,本文构建的“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模型”“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模型”的实用性尚待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需要在增加主观性指标、丰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对旅游产业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跟踪调查,进一步深化旅游业与幸福的相关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张丹婷,邢占军. 旅游与民众幸福感. 旅游学刊, 2019, 34(7): 1-3. [ZHANG D T, XING Z J. Tourism and public happiness. *Tourism Tribune*, 2019, 34(7): 1-3.]
- [2] 周绍杰,王洪川,苏杨. 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管理世界, 2015, (6): 8-21. [ZHOU S J, WANG H C, SU Y. How can Chinese people have a higher level of happines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China people's livelihood Index. *Management World*, 2015, (6): 8-21.]
- [3] 林洪,孙求华. 中国国民幸福统计研究十年简史. 统计研究, 2013, 30(1): 37-43. [LIN H, SUN Q H. A review of the national happiness statistical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10 years. *Statistical Research*, 2013, 30(1): 37-43.]
- [4] 刘长庚,张磊. 新时代消费发展需推动消费量质齐升. 消费经济, 2018, 34(4): 3-11. [LIU C G, ZHANG L.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need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nsumption quantity and quality. *Consumer Economics*, 2018, 34(4): 3-11.]
- [5] 冯卫红. 旅游产业集聚的动因分析. 经济问题, 2009, (7): 114-116. [FENG W H. An analysis 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Economic Problems*, 2009, (7): 114-116.]
- [6] 苏建军,张毓,孙根年. 中国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与贡献度分析. 消费经济, 2016, 32(1): 34-40. [SU J J, ZHANG Y, SUN G N. An analysis of the promoting effect and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tourism consumption on economic growth. *Consumer Economics*, 2016, 32(1): 34-40.]
- [7] 王利伟. 由小康社会到幸福社会: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路径. 宏观经济管理, 2018, (4): 54-59, 71. [WANG L W. From a well-off society to a happy society: An important path for China to achieve its second century goal.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2018, (4): 54-59, 71.]
- [8] 罗霞,张丽华. 旅游产业集聚与城镇化效应测度及路径研究. 湖南社会科学, 2017, (4): 131-137. [LUO X, ZHANG L H.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urbanization effect measurement and path research. *Hunan Social Sciences*, 2017, (4): 131-137.]
- [9] 孙军. 旅游业协调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现代经济探讨, 2019, (8): 35-43. [SUN J. Tourism coordination research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2019, (8): 35-43.]
- [10] 刘佳,赵金张,张广海.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 经济地理, 2013, 33(4): 186-192. [LIU J, ZHAO J J, ZHANG G H. Spatial econometric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4): 186-192.]
- [11] BALAGUER J, PERNÍAS J 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hotel prices: Evidence from business and tourism consumers.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 391-400.
- [12] 王兆峰,霍菲菲. 湖南武陵山区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测度.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 37(2): 94-98. [WANG Z F, HUO F F. Measur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ial cluster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8, 37(2): 94-98.]
- [13] 周杰文,蒋正云,赵月. 生态文明视角下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西部地区为例. 生态经济, 2019, 35(4): 132-139. [ZHOU J W, JIANG Z Y, ZHAO Y. The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aking the western region as an example. *Ecological Economy*, 2019, 35(4): 132-139.]
- [14] 李刚,王斌,刘筱慧. 国民幸福指数测算方法研究.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7(4): 376-383. [LI G, WANG B, LIU X H. On the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5, 17(4): 376-383.]
- [15] 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et al.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Science*, 2004, 306(3): 1776-1780.
- [16] TASHI T, TANDIN D, DORJI P. Progress and delivery of health care in Bhutan, the land of the thunder dragon and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Tropical Medicine & International Health*, 2011, 16(6): 731-736.

- [17] 刘正山. 海外国民幸福指数编制情况概述. 国外理论动态, 2013, (12): 30-35. [LIU Z S. Overview of the compilation of oversea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2013, (12): 30-35.]
- [18] 龙云飞. 公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运用. 人民论坛, 2012, (36): 150-151. [LONG Y F.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ublic happiness index system. People's Tribune, 2012, (36): 150-151.]
- [19] 苏绮凌, 陈文科. 居民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以海南省为例. 调研世界, 2015, (7): 47-51. [SU Q L, CHEN W K. Research 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sidents' happiness index: Taking Hai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2015, (7): 47-51.]
- [20] 朝克, 何浩, 李佳钰. 国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统计与决策, 2016, (4): 91-94. [CHAO K, HE H, LI J Y.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6, (4): 91-94.]
- [21] 陈志霞, 李启明.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及测量. 城市问题, 2013, (9): 52-58. [CHEN Z X, LI Q M.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asurement of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index. Urban Problems, 2013, (9): 52-58.]
- [22] 李军.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编制及影响因素分析. 天津: 天津财经大学, 2013. [LI J. Analysis of the compil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index.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3.]
- [23] 李桢业.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 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 2008, (3): 41-48. [LI Z Y. Inter-provincial differences in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index: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rban residents' statistics in 12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cit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8, (3): 41-48.]
- [24] 吕洁华, 刘飞, 夏彩云, 等. 城乡居民生活幸福指数的对比分析. 统计与决策, 2015, (5): 92-95. [LYU J H, LIU F, XIA C Y, 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ndex of life and well-being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5, (5): 92-95.]
- [25] 梁学成. 旅游产业增进社会福祉的逻辑诠释. 旅游学刊, 2019, 34(7): 3-4. [LIANG X C. A 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s promotion of social welfare. Tourism Tribune, 2019, 34(7): 3-4.]
- [26] 李浩, 袁晓玲, 李毓. 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河南社会科学, 2019, 27(2): 98-103. [LI H, YUAN X L, LI 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leve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on residents' well-being: On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9, 27(2): 98-103.]
- [27] 关兴良, 魏后凯, 鲁莎莎, 等.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机理及其科学问题. 地理研究, 2016, 35(2): 227-241. [GUAN X L, WEI H K, LU S S, et al. Pattern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2): 227-241.]
- [28] 张圆刚, 黄业坚, 程静静, 等. 城市居民压力源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 地理研究, 2019, 38(4): 971-987. [ZHANG Y G, HUANG Y J, CHENG J J, et al. The influ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deconstruction of stressors on enhancing urban residents' well-be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tourism and leisure involvem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4): 971-987.]
- [29] 胡亮梓, 谭益民, 张双全, 等. 集体林区生态旅游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14, 34(4): 121-124. [HU L Z, TAN Y M, ZHANG S Q, et al.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forest ecologic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2014, 34(4): 121-124.]
- [30] “旅游业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作用”课题组. 旅游提升国民幸福: 一个分析框架及应用. 旅游学刊, 2015, 30(10): 18-27. ["Strategic Role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Tourism increases national happines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s. Tourism Tribune, 2015, 30(10): 18-27.]
- [31] 麻学锋, 黄甜甜. 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动力仿真分析.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41(1): 131-141. [MA X F, HUANG T T.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 dynamic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Zhangjiajie.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41(1): 131-141.]
- [32] 邢占军. 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追踪研究. 数据, 2006, (8): 10-12. [XING Z J.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racking research of happiness index. Data, 2006, (8): 10-12.]
- [33] 高园. 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外在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实证调查. 生态经济, 2012, (11): 86-90. [GAO Y. External influential factor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ourist destination residents: Based o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Haina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sland. Ecological Economy, 2012, (11): 86-90.]
- [34] 高苹, 席建超. 旅游目的地网络空间结构及其复杂性研究: 野三坡旅游地案例实证.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1): 85-98. [GAO P, XI J C.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Yesanpo Tourism Destin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 33(1): 85-98.]
- [35] 刘险峰. 城镇居民幸福指数评估模型与实证检验. 统计与决策, 2015, (22): 86-89. [LIU X F. Evaluation model and

- empirical test of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index.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5, (22): 86-89.]
- [36] 姜海纳, 侯俊军. 国民幸福感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算. *统计与决策*, 2013, (23): 4-7. [JIANG H N, HOU J J. Constru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3, (23): 4-7.]
- [37] 周四军, 庄成杰, 刘红, 等. 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NHI的统计测度与评价. *消费经济*, 2008, (4): 90-93. [ZHOU S J, ZHUANG C J, LIU H, et al. Statistic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hunan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NHI. *Consumer Economics*, 2008, (4): 90-93.]
- [38] 牛松. 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评方法研究. 南京: 南京财经大学, 2010. [NIU S. The research to indicators system of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0.]
- [39] 黎昕, 赖扬恩, 谭敏. 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 *东南学术*, 2011, (5): 66-75. [LI X, LAI Y E, TAN M.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system.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2011, (5): 66-75.]
- [40] 黄越, 赵振斌.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景观变化及空间结构: 以丽江市束河古镇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6): 1029-1042. [HUANG Y, ZHAO Z B.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landscape change in tourism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Shuhe Old Town in Lijiang.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 33(6): 1029-1042.]
- [41] 麻学锋, 孙根年. 张家界旅游城市化响应强度与机制分析. *旅游学刊*, 2012, 27(3): 36-42. [MA X F, SUN G N. Analysis of the tourism urbanization response intensity and mechanism in Zhangjiajie. *Tourism Tribune*, 2012, 27(3): 36-42.]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response of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in Zhangjiajie

MA Xue-feng, LYU Yi-xiang

(College of Tourism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sponse of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in less-developed area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It constructs a model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response intensity of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s a one-way Granger causality of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2)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level, the happiness level is affected by different external factors of happines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grey correlation changes from spiritual cultural environment,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non-economic factors to social security environment, life quality environment and other economic factors. (3) The effec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on the happiness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ath of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level which meeting people's material needs first and then meeting their non-material needs. Instead, it passively improves the "non-material" needs and then drives the "material" needs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level.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similar underdeveloped regions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level of resident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Keywords: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level; response; identification; Zhangjiajie